



北京大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

撒切尔夫人下野探源
——基于“疑欧”与“亲欧”之争的分析

**The Eclipse of Margaret Thatcher:
A Study on the Clash between Eurosceptics and Europhiles**

姓 名： 宋仪萱

学 号： 1700014555


院 系： 国际关系学院

专 业： 国际政治

指导教师： 梅然

二〇二一年六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

论文题目 (中文)	撒切尔夫人下野探源——基于“疑欧”与“亲欧”之争的分析				
论文题目 (英文)	The Eclipse of Margaret Thatcher: A Study on the Clash between Eurosceptics and Europhiles				
导师姓名	梅然	职 称	副教	论文成绩 (百分制)	95
导师评语 (包含对论文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等评价)	<p>1989 至 1990 年, 保守党内部两次有议员发起了对撒切尔夫人的党魁地位的“挑战”, 第二次挑战导致了其下野。这两次挑战得以出现并最终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本论文以此作为核心问题。论文强调“欧洲因素”, 或者说保守党内的“亲欧”与“疑欧”之争, 是导致撒切尔夫人遭遇挑战并下野的首要宏观因素。认为欧洲因素相比经济等其他宏观因素更具解释力, 是本文的主要观点所在, 也有学术创新意义。论文参考和引用了能较好涵盖相关研究的不少著述, 逻辑比较清晰、文字通顺, 格式工整, 结构合理。作者对论文的写作从始至终也是积极主动, 定题、列提纲到成稿都很早, 且多有修改。因此, 是一篇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p>				
	导师签名: 				

摘要

1989年和1990年，英国保守党内两次发起对党魁撒切尔夫人的“挑战”。现有研究相关成果比较丰富，但散落在各个角落中不加甄别，不成体系。而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经济问题上的分裂不足以激发挑战，而内政因素则是被误读的突发事件，“挑战”是保守党对欧态度分裂的后果。其逻辑联系是，党内由于欧洲问题而分出派系并持续对立，这分别导致1989和1990年两次挑战，虽然第一次仍有改变、期待余地，但随着处理失当和问题激化，第二次却难以调和，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最后结果，通过“挑战”、劝说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撒切尔夫人的下野。这无疑了解英国政治、探析英欧关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样也是分析今日英国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撒切尔；疑欧；亲欧；议会保守党；英欧关系

Abstract

Two related challenges were launched against Margaret Thatcher from within her own Conservative Party in both 1989 and 1990. Although relevant studies covering so many areas are numerous, the absence of coherence is still too conspicuous to be overlooked. This dissertation, therefore, is intended to fill the blank, revealing that such challenges result from the ideological clash concerning Europe within the party, with economic issues not urgent enough to evoke dissatisfaction and the poll tax only an overstated emergency.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existence of two uncompromising factions that incurred two continuous challenges can be well understood as the antagonism was deepened and run out of control as time goes. There was possibility to compromise during the first challenge, but the controversy over Europe had become pernicious since then due to fatal mishandling and failure to overcome the inner-party split, which to some extent led to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leadership competition, and Mrs. Thatcher eventually had to stand down, quitting the second challenge to appease her junior cabinet colleagues. While essential for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Anglo-European relations, this case plays a crucial part today to fully comprehend British politics as well.

Keywords: Margaret Thatcher; Euroscepticism; Europhilia;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Anglo-European Relations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1
(二) 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2
(三) 文献综述.....	2
1. 微观类型研究.....	3
2. 中观类型研究.....	3
3. 宏观类型研究.....	4
4.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5
(四) 研究方法.....	5
(五) 核心内容和结构安排.....	6
一、“一个女人的偏见”？——欧洲因素导致挑战发生.....	7
(一) 概念界定和背景简述.....	7
(二) 比较经济因素与欧洲因素.....	8
(三) 比较内政因素与欧洲因素.....	11
(四) 小结.....	13
二、“抱怨不断的旅程”？——欧洲因素与第一次挑战.....	14
(一) 起点：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 Act）通过（1986年）.....	14
1. 理想的动机：经济改革.....	14
2. 低调的质疑：分歧伏笔.....	15
(二) 累积：两条线索（1986-1989年）.....	16
1. 节点一：1987撒切尔与罗森的ERM分歧.....	16
2. 节点二：1988布鲁日演说和1989欧洲议会选举.....	17
3. 节点三：1989马德里峰会.....	18
4. 节点四：1989罗森辞职及其余波.....	18
(三) 预兆：第一次挑战及其失败（1989年）.....	20
三、“从未败阵的首相”？——欧洲因素与第二次挑战.....	22
(一) 激化：未成功的调和（1990年）.....	22
(二) 终点：第二次挑战及其成功（1990年）.....	24
结语.....	27
参考文献.....	28
致谢.....	30

绪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1989年和1990年，英国保守党内两次发起对党魁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挑战”（challenge），而此时撒切尔夫人已经担任党魁15年、担任首相10年，并领导保守党赢得了三次大选。这成为了激发本研究的兴趣点：为什么一位功勋卓越的党魁、一位久居巅峰的首相会被连续挑战？而又出于何种原因，两次挑战呈现出不同的结果？这两次连续的挑战是否有内在逻辑联系？这无疑了解英国政治、探析英欧关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此处所谓的“挑战”，是指当时保守党遴选党魁的特殊机制。作为老牌政党，保守党的党魁原先一直由高级内阁官员默认、推荐产生，直到1964年大选失败后，保守党才制定了明确的党魁选举机制。而挑战则是补充内容之一，按规定一年举行一次，想要挑战的议员必须在指定时间内登记，若无人表态，则挑战不发生。它能在党内存在不满、但党魁又无意主动离开时，通过强制方式更换领袖，以反映全党呼声、及时更改政策。根据当时的挑战规则，所有保守党议员均可参与投票，而要想在第一轮取胜，不仅需要绝对多数，还要再获得额外15%的选票；若没有跨过15%的门槛，则进入第二轮投票，本轮中可以加入新挑战者，也可退出挑战，但在此轮获胜只需要绝对多数票，若此轮仍未决胜，则进入最后一轮投票，第二轮中得票前三的议员有资格参与，采用选择性投票制决定最后的赢家。¹

而挑战撒切尔的具体过程也比较清晰。1989年11月，一年一度的挑战开始报名，后座议员安东尼·梅耶（Sir Anthony Meyer）宣布他将发起挑战，由于差距过于明显，这场比赛几乎没有悬念。当年12月5日，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撒切尔314票，梅耶33票，弃权3票，无效票数24票。显然，撒切尔完全超出了15%这一标准，挑战在一轮内终结，撒切尔完胜。然而1990年挑战则大有不同，在当年11月14日，迈克·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正式发起挑战，经历了双方竞选活动后，11月20日第一轮投票结束，撒切尔204票，赫塞尔廷152票，弃权16票。这意味着撒切尔没能在第一轮结束比赛，党魁选举随即进入第二轮。然而，在前一天晚上与每位内阁成员进行了单独会谈后，22日清晨撒切尔正式决定辞去首相职务，退出党魁选举。内阁大臣约翰·梅杰（John Major）和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则加入挑战。最终，梅杰在第二轮投票中取得较大优势，虽未获得过半票数，但赫塞尔廷与赫德都宣布退出并支持梅杰，挑战至此结束，梅杰就任新首相。

毫无疑问，两次挑战、特别是第二次挑战，颇具戏剧性。因此，诸多英国学人已经对撒

¹ 谢峰：《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25-126页。

切尔下野进行过研究，相关成果也比较丰富。然而遗憾的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并未被单独提出，而大多是放在整个撒切尔时代中进行考量。这使读者很难捕捉重点，而“挑战撒切尔”的问题也因此隐没，成为当代英国政治研究中的普通一员，近年来再无人问津。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依托 1980 年代后半期的主要事实，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回答如下问题：保守党内“亲欧”（Europhilia/Europhiles）、“疑欧”（Euroscepticism/Eurosceptics）因素，如何导致了两次针对领袖的挑战发生，又如何造成挑战结果的不同、和撒切尔夫人最终下野。为方便表述，下文会将“亲欧”、“疑欧”的冲突简称为“欧洲因素”或“对欧态度分歧”，在正文中则会进行更明确的概念界定。

（二）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其一，“内政决定外交”似乎早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真理，这不禁使人生疑：是否真的不存在外交倒逼内政的案例？本研究便是反例之一。它最终将揭示：撒切尔夫人及其拥护者处理对欧关系的理念，激起了党内的不满，引发了对党魁的挑战，并最终重塑了英国权力格局。简言之，即对外关系理念的冲突，引发了内政的巨大变动。这是本案例在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层次上的意义，也是为政治学理论可能做出的贡献。

其二，如前文所述，挑战制在当时仍属新鲜事物，而它的前期运用和日趋成熟，则都与撒切尔时代密切相关：如议会保守党的成员如何发挥影响力、内阁成员如何对待高层分歧、挑战者出于何种原因发起挑战等等，都是研究英国政治体制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关注今日英国政党应该具备的知识。为避免研究过于琐碎，本文对于复杂的挑战机制将一笔带过，而更多关注发生挑战的宏观原因。这是本研究对于英国国别研究所具有的意义。

其三，自 2016 年英国发动“脱欧”（Brexit）公投，到 2020 年底完成自由贸易、渔业配比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善后谈判，英欧关系在近年来可谓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要追溯这些问题的源流，详察保守党内的挑战很有必要。本研究的设问和最终结论，无疑都与今日英国“脱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深对于当下国际大事的理解，便是本研究的时政背景。

一言以蔽之，本研究不仅将回答开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论证提出的观点，并揭示两次挑战的内在联系，还将在学科理论和案例、研究方法论等层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同时不脱离实际问题，做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三）文献综述

如前文所述，现有研究中并不缺乏对撒切尔时代的考察，但遗憾的是，现有成果只是将两次挑战看作整个撒切尔时代的事件之一，集中关注的作品极为罕见；而引发挑战、决定挑战结果的因素更是极为琐碎，散落在各个角落中不加甄别、不成体系。下文将其简要归纳为三类，以便于分类观察、指出不足。

1. 微观类型研究

本文所谓“微观类型”是指，从个体因素或偶然因素出发，论证挑战发起的原因或结果。此类研究几乎散见于所有现有成果之中，并且强调的方面颇为类似。这当中比较有归纳性的，应属阿兰·沃特金斯(Alan Watkins)所著的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一书，这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直接研究两次挑战的作品。它整体上依据时间线索，又分不同章节讨论不同原因，其中第二章认为撒切尔不妥协、试图主宰内阁的性格，以及和赫塞尔廷的个人恩怨，一定程度上使挑战无法避免；而第四章认为赫塞尔廷缺乏领导力、过于亲欧和干预经济的主张，又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挑战的结果。¹

还有研究强调另一类个人因素：带领全党胜选的能力。它们的观点是，撒切尔选举吸引力越发减弱，使得议员害怕在大选中丢失席位，从而萌生换掉党魁的想法。² 此类研究大多认为，吸引力减弱是议员对撒切尔最直观的感受，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首相个人的不信任，最终成为发起挑战的首要动因，因此本文仍将其归入微观类型研究。

最后一类微观研究则聚焦于偶然事件，最为典型的是批评撒切尔疏于组织竞选，反倒是在投票日前往巴黎继续外事活动，最终导致第一轮仅差4票便可终结挑战；同时，研究者们认为她的团队过于自信，票数计算偏差过大，没有尽全力争取态度不定的议员。³

微观研究的主要缺点是，将宏大历史事件解构过细，缺乏解释力。后来的首相梅杰有言：“就像之前的首相一样，她的党中当然也有不喜欢她风格、政策的成员。”⁴ 这对一位首相来说不可避免。而挑战涉及的议员、阁员，则毫无疑问不会让情感主导政治决策，尤其是更换首相的决策。而所谓的“选举吸引力”，则犯下了方法论的错误：撒切尔的吸引力降低，和她最终在挑战中失败一样，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研究者们应该解释“选举吸引力”为何下降，而非用下降本身来解释挑战。这种用结果解释结果的路径，最终无疑会变成循环论证。至于偶然性事件，且不论竞选策略是否真的不恰当，仅从逻辑上讲，如果这类微观因素能够成为解释，那么投票当天的天气、1990年11月伦敦的交通状况等因素，恐怕也需要被算作原因之一。本文固然赞同关注历史细节、关注偶然事件，但这种努力应在学科框架内，更要区分不同的事件和时机。就本研究而言，通过微观的个人、情感因素或偶然性论证挑战的发起与结局，实在是缺乏说服力。

2. 中观类型研究

¹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1991, pp. 29-50, pp. 75-96.

² 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 Andrew Denham, “From Ted to Ed: Electing British Party Leader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83, No. 3, 2012, pp. 576-584;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 pp. 22-25.

³ 相对全面的此类研究可见 Timothy Heppell, *Choosing the Tory Leader: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 London & NY: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8, pp. 88-89.

⁴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N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p167.

本文所谓“中观类型”是指，从挑战的机制和规定出发，分析挑战的结果或影响。前文已提及该制度的具体运作方法，此处不再赘述。就国内而言，此类研究的最佳成果应属谢峰《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一书，¹它内容详尽、文献全面，是中文研究的重要参考。

英国学界也不乏程序、机制研究，其中有特点的应属蒂姆·贝尔 (Tim Bale) 所著的 *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 一书，²它更关注战后保守党的决策过程及其演变，并通过案例的形式，间接提及了撒切尔夫人下野的动因。而贝尔的另一本著作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则探讨了党内其它机制的影响，如党魁与党鞭、首相与内阁、阁员与议员之间的关系，并从该角度直接论证撒切尔的下野。³就此意义而言，它们并不雕琢模型与数字，视角更为开阔，可算作广义的“机制”研究。

当然，定量方法的合理运用也有一定启发性。如耶西 (Neal G. Jesse) 教授，他依据“社会选择”理论，选取 1975 年的挑战建立数字模型并验证，之后用结论解释了 1990 年选举撒切尔的失败。⁴而由剑桥大学主办的《英国政治科学期刊》则刊载了对 1990 年第二轮挑战（撒切尔退出后的一轮）的定量研究，作者通过分析议员的三大项、七小项背景，证明了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对欧态度因素，是第二轮投票的意向主导。⁵

此类研究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关注机制运转的文字规定和繁琐细节，而定量研究则更拘泥于模型、数字和具体行为，呈现出断裂、孤立的特点，根本无法还原某一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机制固然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但运用机制却只能是人的工作，如果仅仅关注机制本身，那么出于什么原因启动机制、机制导出的结果为何不同，实际上就会被忽略，而这恰恰牵涉到本文的议题。因此，它们的部分结论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研究过程和事件选取，仍然不能满足本文的需求。

3. 宏观类型研究

本文所谓“宏观类型”是指，从发起挑战或决定成败的原因出发，对两次挑战进行论述或分析；根据开篇提出的问题，此类研究在层次上也与本研究最为接近。最具归纳性的仍属沃特金斯所著的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它用第三章的篇幅介绍了内政改革造成的弊端，第五、六章则阐述了欧洲因素的负面影响。⁶与之类似，艾瑞克·埃文斯 (Eric J. Evans) 所著的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 也分章节讨论了经济议题和欧洲问题，比

¹ 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参见谢峰：《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第 127-137 页。

²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45-296.

³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 p29.

⁴ Neal G. Jesse, "Thatcher's Rise and Fall: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ory Leadership Selection Process," *Electoral Studies*, Vol. 15, No. 2, 1996, 183-202.

⁵ Philip Cowley and John Garry,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 The Choosing of John Maj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3, 1998, pp. 473-499.

⁶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p. 50-75, pp. 96-156.

较客观地记录了相关事实。¹除此之外，则都是讨论英欧关系的著作，在探讨“疑欧”问题时援引案例，才涉及有关的宏观因素。²

相比较而言，微观研究难以服人，中观研究缺乏重点，宏观研究则解释力更强，更有利于历史事实和科学解释的有机结合。然而遗憾的是，此类研究与微观、中观混杂在一起，并不单独成文，反复提到的沃特金斯的著作，也只是通过章节进行了区分，就整部作品而言仍是混乱的；而相对系统性的研究，却又大多是旁敲侧击，缺乏直观性。最关键的是，每个因素都只是罗列式陈述，难免流于表面化，使研究更像是说明、而不像是论证，遑论因果机制的考察。简言之，他们忽视了各因素的轻重缓急、未区分挑战的原因与结果、不强调具体因素的发展累积。这些不足都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空间。

4.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由于聚焦挑战的宏观原因，即“欧洲因素”，本文依靠的主要材料也有取舍。在确定并排除干扰因素时，本文主要参考阿兰·沃特金斯所著的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它在前文已被多次提及，概括程度相对较高；而在观察欧洲因素的具体演变时，本文主要参考安东尼·福斯特(Anthony Forster)所著的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³和雨果·杨(Hugo Young)所著的 *This Blessed Plot* 中的有关章节；⁴同时，本文还参考了相关期刊文章和当事人回忆录，⁵目的是把握时间线索、补充历史细节。而谢峰所著《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和比尔·考克瑟(Bill Coxall)等人编著的《当代英国政治》中译本，⁶则提供了其他有关信息，是本文重要的背景材料。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不同的主题、材料，在不同的论证环节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其中贯穿全文的是案例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在论证欧洲因素是引发挑战的主要原因时，主要采取控制变量法、历时比较法和求异法，以证明其他因素在挑战中不起关键作用；而在观察两次挑战的内在联系、解释挑战结果为何不同时，主要采取进程追踪法，还原重要时间节点和转折性事件，突出因果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过程。

¹ Eric J. Evans,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7, pp. 108-117, pp. 79-90.

² 有代表性的如 N. J. Crows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 At the Heart of Europe?*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7, pp. 71-89, pp. 152-188.

³ Anthony Forster,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2, pp. 63-83.

⁴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98, pp. 306-375.

⁵ 文中的“当事人”主要指三位，即撒切尔夫人、挑战者赫塞尔廷、新首相梅杰，参见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p. 536-560, pp. 642-668, pp. 688-768. Michael Heseltine, *Life in the Jungle: My Autobiograph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2000, pp. 342-392.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⁶ 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第四版）》，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五）核心内容和结构安排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挑战是保守党对欧态度分裂的后果；其逻辑联系是，党内由于欧洲问题而分出派系并持续对立，这分别导致 1989 和 1990 年两次挑战，虽然第一次影响不大，但随着处理失当和问题激化，在 1990 年第二次挑战中，他们最终成功逼退了“疑欧”的撒切尔（见图 1）。这也是对本文开篇问题的回答。

下文将分三部分展开论证。第一部分会证明对欧态度的分歧是引发挑战的主要原因，它将通过比较的方式，驳斥其他宏观原因，回扣文献综述部分的论证。第二、三部分解释两次挑战如何发起，及结果因何不同；其中第二部分将对欧态度分歧的萌生为起点，借助节点时间，关注该分歧逐渐积累的过程，并解释第一次挑战失败的原因；第三部分将探讨分歧的激化，以及第二次挑战的成功，目的是强化欧洲因素的解释力（见图 2）。

应说明的是，虽然影响政治家的因素繁多，但就此时的选举程序和社会状况而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地方议会、媒体等都还不能算作独立的力量，他们只能通过影响议会保守党（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内阁阁员而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因果机制也主要通过这两个层面发挥作用，而不考虑其他变量给对外政策造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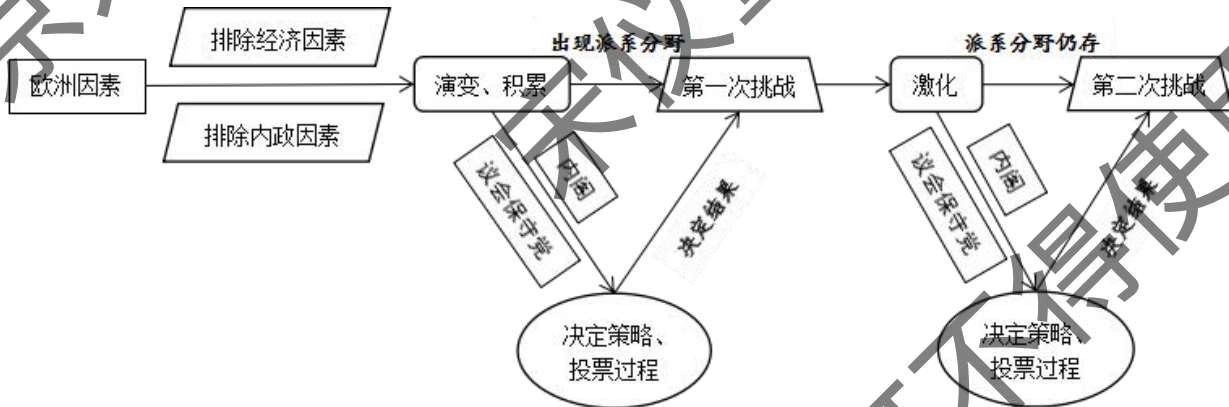


图 1：文章核心因果机制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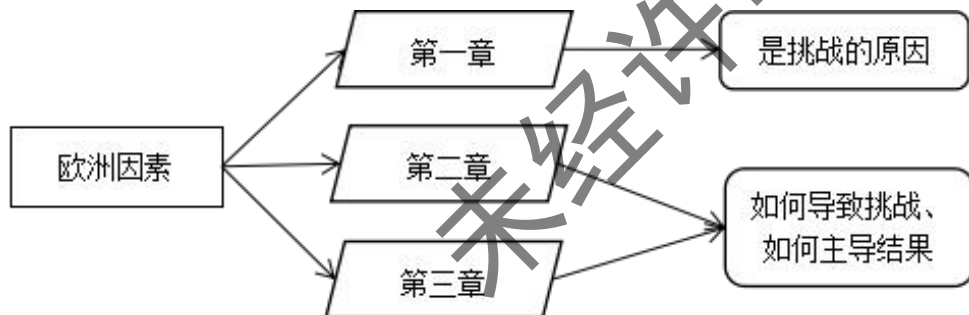


图 2：文章结构

资料来源：自制。

一、“一个女人的偏见”？¹——欧洲因素导致挑战发生

根据对现有研究的回顾，本文认为，已有成果虽未能将挑战的原因系统化，但也基本将各种可能罗列完毕，并已在学界达成共识。本文不试图重复叙述存在哪些原因，而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一章的篇幅，排除其他主要原因，证明对欧态度分歧是关键和核心。然而，在观察、比较、否定各原因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和事件背景作提前说明。

（一）概念界定和背景简述

首先应定义“疑欧”。保守党内对欧怀疑的声音由来已久，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体现，即便二战后也有多次流变。²而本文的“欧”指的是一体化的欧洲，而非地理或其他意义上的欧洲；与之相应，“疑欧”则主要限定于：不赞同欧洲一体化朝政治、社会领域发展，不赞同欧元区、欧洲联邦等破坏国家主权的措施，但主张统一市场、减少关税、降低投资壁垒。因此，“疑欧”也并非完全反对一体化，恰恰相反，他们在自由经济层面是一体化的鼓吹者、受益人，这在最“疑欧”甚至“反欧”的布鲁日演讲（the Bruges Speech）中均有体现。³相对照的是，“亲欧”则赞成上述各项举措，或者认为疑欧派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欧洲并没有联邦化、官僚化。二者的分野和对立，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与之相关，本文中“欧洲因素”、“对欧态度分歧”等说法，均指向上述两派的对立，这与绪论部分是一致的。

而所谓“宏观原因”，结合文献回顾部分，就本章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除已经定义的对欧态度分歧外，本文认为还有经济因素和内政因素。前者指党内关于凯恩斯经济学、国家干预程度、私有化执行程度、社会福利内容等出现的分野和争论。众所周知，撒切尔代表的是货币主义经济学，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大规模私有化、控制福利；由于这些政策拒绝折

¹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71. 本节标题来源于 Young 对赫塞尔廷的采访。采用这一评价作为标题，其一是因为它十分知名、指代性强，来自于挑战者对首相的评价，能较好体现党内分歧；其二是突出本节排除干扰因素、证明欧洲因素重要性的主旨；其三，本章进行的是宏观因素研究，而该评价则体现“微观因素”，因此使用问号结尾，表示不赞成。

² 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①认为这是一种国民认同，即英国不仅地理上与欧洲分离，更关键的是在心理上与欧洲一体化不同，特别是 1957 年罗马条约规定的那种一体化；这种定义认为疑欧者更关注全球利益和英联邦，因此撒切尔时代的疑欧并不是原创，只是一种承袭；参见 Oliver Daddow, “Margaret Thatcher, Tony Blair and the Eurosceptic Tradition in Brita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2013, pp. 212-223. ②认为它体现在四个层次：战后初期的全球英国战略、议会单一主权而非联邦、保守党反乌托邦的实用主义、英国人的自由传统，这类观点涉及的范围更广、层次更多，更利于观察历史流变；参见 Cary Fontana and Craig Parsons, “‘One Woman’s Prejudice’: Did Margaret Thatcher Cause Britain’s Anti-European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ervice*, Vol. 53, No. 1, 2015, pp. 90-91. ③认为是怀疑英国是否应该卷入欧洲一体化的观点，特别指向欧盟等机构、并且跨党派存在；这类观点认为疑欧派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强调自主权，与前两者角度不同。参见 Anthony Forster,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 p2. 本文的定义部分来自 Andrew Gamble, “Europe and America,” in Ben Jackson and Robert Saunders, *Making Thatcher’s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21. 由于并非本文主旨，因此正文将直接给出定义。

³ Margaret Thatcher,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20 September, 1988.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上网时间：2021-3-9。

中、态度鲜明，因此持相同观点者被称为“干派”（dry）；而赞成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者被称为“湿派”（wet），他们的主张与撒切尔相反。本章要证明的第一点，便是“干派”和“湿派”的争论不是引发挑战的原因。而内政因素主要指八十年代后期的地方财政改革，特别是矛盾最为尖锐的“社区税”（community charge），或被俗称为“投票税”（poll tax）。本章要证明的第二点，便是关于“投票税”的争论同样不是引发挑战的原因。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不否定存在其他宏观因素的可能性，只是根据相关研究者的归纳，以及因素本身的重要程度，再结合“排除”工作的性质，本文不认为其他因素能干扰视听，故不作讨论。

（二）比较经济因素与欧洲因素

不妨首先关注经济因素。按常理，经济问题与选民利益密切相关，理应是每个政党的核心关注点，保守党自然不例外。二战后，党内的确因经济观点分成了不同派别，力量也此消彼长，平日里难分胜负。1945年大选应当是这一争论的开端，在当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坚守自由经济理论，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学说写进了竞选纲领，对抗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¹而随着大选的失败，保守党内部开始争论，即是否应部分采纳工党的经济主张、向福利国家靠拢。1951年重新执政后，他们变相承认了工党的经济政策；而“共识政治”的兴起，标志着干预派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此后，两派力量此消彼长，1964、1970、1972、1974等诸多年份都发生过激烈斗争，并延续至1979年大选之后。²

然而，正因为经济议题如此重要，再结合上述事实，本文认为，该争论导致保守党人事变动，一般都在大选结果落定后立即发生：即根据党魁在大选中的表现，以及选民的意见来更选领导人，胜利则已，失败则必然面临党内的压力。除了1945年失败后的争论，其它例子如1959年大选胜利后，奉行中间政策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政府获得认可，继续执行该政策，保持了总体上干预经济的倾向。³又如挑战制度出台后的1965年挑战，保守党在前一年大选中失败，因此，和工党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成为了党员的普遍要求，他们中很多人便将希思（Edward Heath）当选看作变革的预兆。⁴

这便与“挑战”格格不入。前文所述，挑战制是一项特殊的遴选机制，应用条件相对复杂。但是经济问题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有大选作为衡量标准，很难与一场急迫的、具有颠覆性的挑战联系起来。换言之，议员若对党魁不满，完全可以根据大选结果，在选举结果出炉后提出质疑，而不是在平日里无征兆地发难。这也符合二战后一直以来的惯例。

那么这一思路符合1979年之后的事实吗？本文认为是符合的。在1979、1983、1987

¹ E. H. H. Green, *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 Conservative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9-220.

² *Ibid.*, pp. 224-227.

³ *Ibid.*, pp. 176-177. 除此之外，在金融、投资等层面麦克米伦同样遵循调和政策，参见 pp. 180-191.

⁴ *Ibid.*, p227.

年三次大选中，撒切尔领导保守党取得三连胜，这不仅挽救了英国经济，更让撒切尔推崇的自由经济深入人心。而众所周知，在第一个首相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只是缓进式推行私有化等经济政策，对工会也采取妥协的态度。1983年之后，特别是当年大选之后，相关政策才迅速推开，并最终取得了成绩。那么，如果经济因素能够成为挑战的动因，为什么不在撒切尔羽翼未丰时进行，反倒是在她已执政十年、自由经济已深入人心时发起挑战？事实上，有学者记述，在1981-82年间，党内曾有风闻说“湿派”会挑战撒切尔，但最终无事发生。¹这无疑证明了本文推断的合理性：既然大选中撒切尔赢得了选民，那么在执政阶段，经济争论不会导致人事变动。而随着撒切尔持续获胜，“湿派”力量不断萎缩，她也成功重组内阁、重塑国家经济形态，党内的“湿派”即便想违反惯例，也没有能力发动挑战了。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87年大选胜利后，英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即通货膨胀率上涨、物价上升等一些经济过热的表现，党内也的确出现了争议。²然而，这些争议决非“湿派”与“干派”之争，而是占主导的“干派”内部对解决办法的技术手段之争：撒切尔认为应通过利率调整来控制，而时任财相相奈杰尔·罗森（Nigel Lawson）认为应从国际机制、特别是欧洲机制入手；³这看似像经济干预，但二人都认为自己代表着市场，都认为自己的政策才是市场主导、减少干预的最佳方案，⁴因此说这是内部的争论。可能会有议会中残留的“湿派”趁机讽刺、发泄不满，但决不会是引发挑战的原因。

作为老问题、老争论，经济因素贯穿了保守党二战后的全部历程，很难为突发的“挑战”负责。然而反观欧洲问题，则无疑是一个新加入的变量或“新问题”，并且是快速累积、发酵的问题。作此论断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于种种原因，英国总体上在对欧洲态度方面大同小异，只有1975年留欧公投曾引起小小的波澜；但是，欧共体八十年代的重新活跃，以及欧洲一体化的重新启动，打破了这种宁静，英国不得不正视欧洲议程上的分歧。

同时，它又与经济争论迥然不同。其一，更为紧迫和尖锐，持反对意见者更多，且没有明显占上风的派别：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如财相和外相，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亲欧的一派，⁵而疑欧一派势力也绝非弱小，他们以撒切尔为代表，但更多处于内阁中相对不重要的职位，话语权更少，这在后文还会论及。其二，它缺乏约定俗成的解决模式：由于是新问题，它没有大选裁决的惯例；同时，欧洲方面推进计划的步伐越来越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提议和计划，后期还设置了自动推进的程序，留给英国政府反应的时间很少，不像经济议题那样可以等待检验，更不可能有时间塑造全民共识，所以它也不能由大选裁决。因此，欧洲

¹ Eric J. Evans,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 p108.

² Ibid., pp. 111-112.

³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697, pp. 706-707.

⁴ Ibid., p701, pp. 723-724. 罗森的理由参见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41, pp. 343-344.

⁵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51.

因素无疑比经济因素更容易引发挑战，目的是及时调整政策，化解迫在眉睫的危险。

这种紧迫性随时间流逝越发明显，在撒切尔时代后期，它甚至囊括了经济分歧，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个分支；换言之，经济因素即便有作用，也只能通过欧洲因素得到发挥。证据是，如前文所述，时任财相罗森认为，加入欧洲的“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以下简称ERM）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好办法。而撒切尔夫人反对这一观点，她认为罗森的观点没有依据，恰恰相反，加入该机制不一定会解决通胀问题，但一定会带来主权上的其他问题：¹基于保卫主权的角度，她坚持前文所说的利率方法，而拒绝欧洲机构染指国内。换言之，是对欧态度分歧的出现，才使“干派”内部的分歧暴露出来；而随着欧洲问题不断深入，经济上的分歧越发居于从属地位，甚至成为了欧洲问题经济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²

欧洲因素压倒经济因素，最直观的观察角度则是挑战者的表述。这并不是说要引入“微观”解释，从挑战者个人是否憎恶某项经济政策来分析挑战；恰恰相反，也许他本人喜欢撒切尔的政策，只是他想要争取的力量更倾向于颠覆这一政策，他不得已成为代言人而已。作为政客，他们当然希望挑战能够取得成效，这要求他们争取力量最强的一派，至少是在他们心中的最强的一派。第一次挑战的挑战者是安东尼·梅耶，他本人的直接表态是，欧洲问题是他发起挑战的原因，³换言之，他想争取或唤醒的是“亲欧”的力量。第二次的挑战者赫塞尔廷，在宣布挑战时的演讲中，丝毫未提经济因素，反倒一开篇便提到了欧洲问题造成的分裂，又在结尾对撒切尔的成就表示敬意，誓言捍卫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⁴因此，结论是，无论挑战者本人意愿如何，他们都完全或部分致力于吸引“亲欧”力量，却丝毫没有吸引“湿派”或其他经济上反对者的打算。

综上所述，从时间线索、紧迫性和挑战者吸引的派别综合判断，欧洲因素才是引发挑战的原因，经济因素相比之下基本不造成影响（见表1）。

表 1：比较经济因素和欧洲因素何者是挑战原因

比较经济因素和欧洲因素何者是挑战原因		
	经济因素	欧洲因素
历时比较	长期存在/常量	新出现/变量
紧迫性比较	低	高
派别力量比较	（挑战者评估）低	（挑战者评估）高

资料来源：自制。

¹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01.

² 见后文。

³ Philip Norton, “Choosing A Lead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1990,”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43, No. 3, 1990, p254.

⁴ Michael Heseltine, *Life in the Jungle: My Autobiography*, pp. 362-363.

（三）比较内政因素与欧洲因素

内政因素即“投票税”引发的动荡。简单地说，投票税是一个替代方案，是地方财政来源的新方式。由于原先的体系缺乏公平且极其复杂，因此，撒切尔政府承诺以人人平等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即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每年缴纳同样的税款，用于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¹由此可见，它与经济因素不同，并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反倒和欧洲因素类似，是全新的争议。因此，对投票税的观察，只能还原历史细节，并根据其演变过程得出结论。

在投票税正式在英格兰地区实施前，它更多是操作方式的争论，即渐进转轨还是激进转轨。根据时任负责人贝克（Kenneth Baker）起草的方案，他希望暂时维持原先的体系，同时不断减少其所占比例，引入投票税逐渐取代，预计时间是三到十年。²然而在1987年大选前后，撒切尔夫人和继任负责人里德利（Nicholas Ridley）却转向了快速变革。³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最能代表各方力量利益的。⁴最终激进方案取得上风，转轨期大大缩短、后来直接废除，兜底政策则是中央政府可以规定额度上限。⁵然而1988年投票税通过立法程序后，各地区的税费估计额却出乎意料地高，民调好感急转直下，撒切尔在1989年7月任命彭定康（Chris Patten）取代里德利，同意对投票税方案进行重估（review），⁶梅杰也从财政上提供了帮助，⁷确保投票税能在1990年4月1日正式实施。此后经过漫长的拉锯，彭定康于当年7月宣布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以大幅降低人均税额，危机告一段落。⁸

因此，投票税在1989年挑战发生时并不引人关注，此时各郡各市的具体税额还未出台，只有媒体的推测；⁹但在1990年挑战发生时，它又已经被修补、完善，重要性同样不如以往。换言之，投票税问题最尖锐的时候，恰好是两次挑战之间。可能有观点认为，修补方案毕竟是临时的，它不代表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本文不反对这种质疑，但是，这不能说明它仍是棘手的问题。在七月的修正中，法案获得了党内的高票赞成，如果后座议员真的痛恨投票税，为何要在此时团结起来促进修正？撒切尔和梅杰都认为，投票税的思想大家都赞成，只是具体额度太高；¹⁰那么当具体问题得以解决，反对意见又依托何物得以继续存在？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1990年3月底发生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抗

¹ Conservative Party, *1987 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 The Next Moves Forward*, 1987.
<http://www.conservativemanifesto.com/1987/1987-conservative-manifesto.shtml>. 上网时间：2021-5-27.

²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p. 61-62.

³ Ibid., p65.

⁴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652.

⁵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67.

⁶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172.

⁷ Philip Norton, “Choosing A Lead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1990,” p258.

⁸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72.

⁹ 根据梅杰的回忆，各郡发布税额主要在1990年1月，而两次挑战均在当年11月，参见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173.

¹⁰ Ibid., p216.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659.

议示威，是否是投票税问题十分尖锐的证据？首先，这场示威最终演变成骚乱，警察介入后迅速平息，¹它已不再是和平示威、表达诉求的范畴。其次，如果当中的确有不少对投票税不满的民众，那么三月末宣布的财政补贴，再加上七月做出的调整，也足以满足他们的诉求，这与前文所说的后座议员同理。因此，此次骚乱只是投票税危机到达巅峰的爆发，而非危机仍然存在的证据。

议会中的情况同样在缓和，后座议员所谓的大选失利前景，实际上也在好转。举例如，1990年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保守党表现不俗，撒切尔本人将其归功于自己的策略，即引导公众关注各地区投票税的差距，以说明是地方工党政府的无能，导致了部分地区投票税虚高；²无论是否如此，它至少证明保守党的大选前景并非暗淡。再例如，中央政府打赢了一系列官司，在司法上确认了给投票税确定限额是合法的，³以保证税额不会再次失控，以及对投票税的修补可以持续。此外，苏格兰地区早一年实施投票税，第一年同样十分混乱，但是第二年便归于正常，⁴而此时距离大选还有两年左右时间，投票税在英格兰地区不一定会如何发展。然而，作为对竞选承诺的兑现，1991年3月，梅杰政府正式宣布了投票税的取代方案，并在1992年大选前完全废除了投票税。

除此之外，不妨考察如下假设：如果没有投票税危机，挑战还会出现吗？答案无疑是会的。1989年挑战前文已经述及，挑战者出于欧洲原因，触发挑战机制。至于1990年挑战，赫塞尔廷在当年多次声明，他没有挑战撒切尔夫人的打算，只是在时任副首相杰弗里·豪（Sir Geoffrey Howe）突然辞职、发表演讲后，他才改变了主意。⁵而豪的辞职与投票税基本无关，反倒是与欧洲问题密不可分。因此，挑战者仍是出于欧洲原因，触发挑战机制。

综上所述，投票税危机的高峰在1990年第二次挑战前便已渡过，对其修正和弥补稳步进行，并且前景得到了保证，危机本身也得以控制，因此它不是发起挑战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投票税也成为了一场激烈危机的象征，一次巨大分裂的代名词。它激发了保守党对分裂、动荡、缺乏统一领导的恐惧，这种恐惧附体到欧洲问题上，进而促成了1990年挑战的发生。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描述，那么欧洲问题就是干柴与烈火，它自身便足以燃烧；而投票税所造就的恐惧，则是助长火势的阵风，让火烧的更旺盛、造成的破坏更强烈。

投票税所造成的巨大的余波，与其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它比欧洲因素出现更晚，发酵速度更快，但是解决得也更快；相比之下，它的影响力更集中、更突出，比长期积累、最终爆

¹ 撒切尔本人直接将其归为极左分子的阴谋，参见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661. 梅杰也部分认可有煽动者在其中，作为投票税的废除者，他的观点可能更具说服力，参见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173. 其他佐证如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71.

²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664.

³ Ibid., p665.

⁴ Ibid., p655.

⁵ Michael Heseltine, *Life in the Jungle: My Autobiography*, p362.

发的欧洲因素更吸引眼球，迷惑性也更强。因此，梅杰的判断是部分正确的：如果投票税单独出现，它不会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¹如前文所述，它处在两次挑战的中间，第二次挑战前已被基本解决，只残留一种恐惧或动荡的“感觉”；而正因为此时欧洲因素也骤然激化，投票税才会被误认为造成了影响，成为了需要被排除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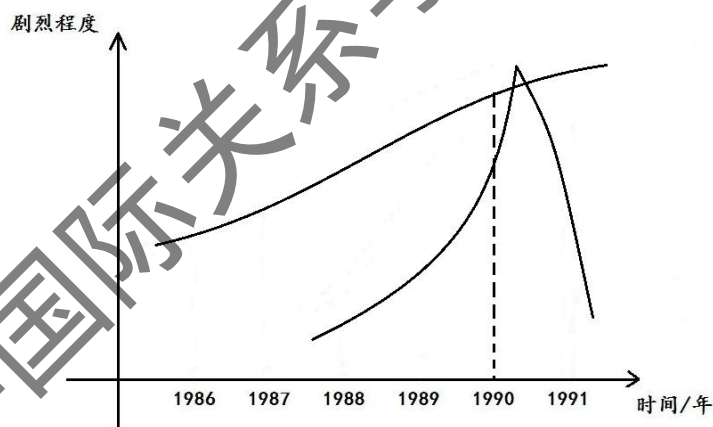


图 3：内政因素和欧洲因素演变示意图

注：虽然时间短暂，但内政因素毕竟引发了暴力事件，而欧洲因素没有，因此本文认为内政因素在最高点时应比欧洲因素更激烈。

资料来源：自制

（四）小结

本章用两节的篇幅，论证了经济问题上的分裂不足以激发挑战，而内政因素则是被误读的突发事件，同样不能为挑战负责。因此，欧洲因素便从庞杂的事实、散乱的论述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了对挑战负责的唯一宏观因素；或者说，相比于公认的其他因素，欧洲因素的作用远超其他原因，以至于其他因素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比较的过程也足以证明，欧洲因素自有其逻辑，完全不是“一个女人的偏见”这么简单。

然而，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解释：按本章所言，欧洲因素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积累已久，那么为什么至 1989 年才有挑战发生？此外，挑战一年一度按期举行，因此，两次挑战可以说是连续发生的，然而两次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具体而言，为什么第一次挑战会失败？为什么第二次挑战虽未能在投票中击败撒切尔，但最终成功更换了首相？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就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将原因和结果一以贯之，增强欧洲因素的解释力。

¹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167.

二、“抱怨不断的旅程”？¹——欧洲因素与第一次挑战

前文论证了对欧态度分歧是引发挑战的原因：遗留的问题是，为什么挑战出现于1989年？又为什么两次挑战原因相同，结果不同？本章就将系统性展示欧洲因素的积累发展，解释欧洲因素何以激发第一次挑战，并决定其结果。如前文所述，欧洲问题虽然是保守党的老问题，但却在相当长时间内不甚明显；而作为共同体的欧洲，也是在很晚近才出现。因此，作为撒切尔下野的研究，本文将1980年代中期作为起点，避免追溯过远。

（一）起点：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 Act）通过（1986年）

在第一任期内，撒切尔主要关注的是预算问题，她强硬施压法德、“要回我们的钱”等等表现，推动了相关议题的协商，欧洲各国终于在1984年解决了预算分摊问题；撒切尔虽然当时仍不满意，但也最终接受，双方达成一致，前期的英欧冲突至此暂告段落。²然而撒切尔夫人却并不满足于此，她决心推动新的议程。

1. 理想的动机：经济改革

简而言之，撒切尔夫人想要让欧共体彻底摆脱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成为真正的共同市场，完全普及自由市场经济。这当然是撒切尔对内政策的延续，同时，它也是当下的总体潮流——七十年代的经济衰退，促使欧洲国家同样转向自由经济。因此，打破关税壁垒、破除不合理限制、推动人员资本流动等等诉求，被冠以“公平竞争环境”（level playing-field）的名号，成为了欧共体其他主要国家的目标。³以此观之，双方在经济自由层面至少是契合的。这推动了撒切尔的议程，使得所谓“单一市场”谈判能够迅速开展。

为了确保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能够通过单一市场的决定，撒切尔和时任财相杰弗里·豪决定打破常规，通过一份“君子协定”，确保和单一市场有关的议程不必全体通过，只需加权投票通过即可。同时，其它议程继续保留全体一致原则。⁴在1985年6月召开的米兰会议上，撒切尔对发生的意外做出了妥协，并在之后的半年时间中多次让步，目的都是促使单一市场法案尽快通过。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1986年2月底，“单一欧洲法案”正式签署，同年4月，法案在下院通过，确认1992年前完全建立欧洲的共同市场。杨在总结评价认为，该法案中英国得益最多，远超其他国家。⁵

¹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p. 174-175. 原文意为：首相无疑登上了“欧洲列车”，尽管她对行驶的方向感到不安，并在每一站都大声抱怨。采用这一比喻，其一是它能较好地这一时期英国和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尽管只停留在表象；其二，它反映出此时亲欧、疑欧两派处于争斗状态；其三，实际上并非抱怨不断，而是另有其因，后文会提及，因此结尾使用问号，表示存疑。

²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p. 324-325.

³ *Ibid.*, p326.

⁴ *Ibid.*, p330.

⁵ *Ibid.*, p334.

2. 低调的质疑：分歧伏笔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撒切尔多次让步，为何最终得益最多？毫无疑问，得到的利益是经济层面的，但出让的却是政治利益，该法案的下院正式名称《欧共同体法案修正案（European Communities (Amendment) Bill）》便揭示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一项涉及面广、具有结构意义的法案。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主要起草者，却是撒切尔派往欧共同体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英国代表。这位代表似乎曲解了首相的本意，“忽视了更大的政治问题”，试图将宪法性权力、国民情感、增进自由等事项也加入其中。¹这完全偏向了另一种意见，即要想真正打破壁垒，那么必须将“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也打破，将国家权力汇集到欧共同体手中，实现政治上、社会上的一体化，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委员会主席德洛尔（President Delors），而该法案也被看作“德洛尔计划第一阶段”的前期铺垫。

作为日后疑欧派的领袖，撒切尔夫人显然反对政治、社会一体化，那么她此时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据她自己回忆，其一，社会领域和文化价值统一，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只是代表了各方对一个“联盟”的幻想，因此难以拒绝；其二，她赞同政治上的合作，但认为这是福克兰战争（the Falklands War）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创制机制、攫夺主权。²更关键的是，她清楚加权投票制是一种妥协，同时也确保了社会领域英国的保留执行权。³简言之，撒切尔对政治合作的理解与其他国家不同，同时认为社会领域合作只是空话、宣言，没有意义。如果她的一家之言不够客观，那么其他研究可以作为旁证：沃特金斯也采信该说法，⁴还有学者关注到了语言表达的差异，⁵更有学者直接评价撒切尔此时过于天真，没能理解对方的深层含义。⁶杨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撒切尔十分了解该法案，自信能够控制局面，只是后来失控。⁷尽管侧重不同，但至少最后结果是肯定的，那便是包括撒切尔在内的疑欧派，当时并未提出高调的反对，欧洲因素并未造成明显影响。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在批准法案时，议会保守党中便已出现低调的反对声，特别是反对欧洲法院职权、欧洲议会改名（从 Assembly 改为 Parliament）等政治进程。⁸虽然这些疑欧派没有公开反对政府，但相关意见的确产生了影响，撒切尔后来也对此时便提出警告的议员表示赞许。⁹这证明，关于委员会权力扩大的问题，在当时的确引发了讨论，只是规模上并不引人注目。结论是，欧洲因素就此萌生，但随即又归于平静。

¹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547.

² Ibid., p550, p548.

³ Ibid., p555, p553.

⁴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15.

⁵ N. J. Crows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 At the Heart of Europe?* p52. 值得一提的是，该著作对单一欧洲法案的节点意义评价与本文基本相同，也认为这标志着分歧的开始。

⁶ Eric J. Evans,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 p88.

⁷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p. 336-337.

⁸ Ibid., p335.

⁹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556.

（二）累积：两条线索（1986-1989年）

议会保守党虽然出现分歧，但影响很小，加之一段时间内欧共体决策相对平稳，因此这种分歧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当它再次显现时，境况则大为不同——内阁因为欧洲出现了意见对立。众所周知，内阁是政府的核心，人数少、资历高、影响力强，而议会保守党人数众多，其中更不乏资历浅、话语权小的后座议员，显然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因此，当欧洲问题蔓延至内阁时，它的积累速度明显加快，造成的后果无疑也更加严重。

1. 节点一：1987 撒切尔与罗森的 ERM 分歧

前文曾述及，ERM 是汇率机制，它是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一部分，旨在保持稳定的汇率，成员国的汇率未经协商一致不得变动。¹事实上，1985 年便发生过一次争论，罗森那时便要求加入该机制，但正如第一章所述，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撒切尔的处理方式和罗森不甚相同，因此此事未能成行。然而罗森做出了大胆的举动，未经批准仍然实质上执行该决定。这意味着，英国虽然没有加入 ERM，但相关政策却完全按照加入的情况制定（“shadow the Deutschmark”），除了缺乏文字上的程序，事实层面几乎分毫不差；同时，撒切尔对此并不知情，她仍以为政策是根据英国实际而制定的。

然而隐瞒并没有持续很久。1987 年 11 月，撒切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要采取这些财政措施，撒切尔此时才意识到财相正在做什么。12 月初，她在内阁会议上抛出了这一问题，认为这种干预措施会导致通胀等严重后果；罗森却认为干预被“中和”了（sterilized），并不会引起通胀。²然而事实是通胀率的确开始增长。自此，双方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争论焦点也变为是否相信欧洲机制，具体手段则完全成为其分支问题。

之所以下此结论，还有另一个原因：作为经济议题，撒切尔夫人并非完全反对固定汇率，但她更希望保持政治上的灵活性。³至于货币问题，她采纳了另一套方案，即由英国控制的 hard ecu（European Currency Unit）计划，⁴两者的不同自然在于主权、政府间合作等政治领域。撒切尔曾通过这一疑欧式方案，试图抗衡德洛尔计划，建立政府合作式货币联盟。⁵

概言之，选取 ERM 分歧作为节点，原因在于：它见证了经济问题转向从属，而欧洲问题迅速崛起的过程；它也是欧洲问题成为一个问题、正式进入内阁的界标。撒切尔回忆说，自该事件之后，她与罗森的关系越来越差，双方也仅维持表面的团结，⁶实际上则为了 ERM 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各说各话。至此，欧洲因素自 1986 年于议会保守党萌生、又归于平静后，在 1987 年底于内阁重新浮现，并开始了两条线索上的同时积累。

¹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41.

²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p. 701-702.

³ Ibid., p701.

⁴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41.

⁵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50.

⁶ Ibid., pp. 702-704, pp. 741-742.

2. 节点二：1988 布鲁日演说和 1989 欧洲议会选举

1987 年末至 1988 年初分歧显现之后，撒切尔和罗森仍然维持着合作，正如撒切尔自己回忆说，在 ERM 的问题上他们尖锐对立，然而在更广泛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下简称 EMU）问题上，他们却高度一致，双方都厌恶这种明显剥夺主权的行为。¹因此，在 1988 年之后一段时间，内阁整体上维持着平稳。

然而 EMU 却得到了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极力推荐，根据他们的方案，不仅欧洲中央银行指日可待，委员会也会变成无所不包的机构，涉足各个领域，且权责严重不相称。撒切尔对此感到沮丧和愤怒。²她认为必须有所反击，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选择，为欧洲指明真正的光明道路，这便是布鲁日演讲，即 1988 年 9 月在欧洲学院的演讲。由于这次演讲十分知名，本文不再赘述其内容，但它对议会保守党的影响却不可不提。撒切尔认为演讲十分成功，得到了议会乃至全国的欢迎；³议会保守党也的确做出了反应，成立了“布鲁日研究小组”（the Bruges Group），表达对撒切尔及其欧洲观点的赞同。⁴

这证明了布鲁日演讲的节点意义：议会保守党至此开始出现选边站队现象，疑欧、亲欧两个对立阵营出现；议员应归属其中一个，也成为显著的趋势。诚然，这种分野可能仍不甚清晰、发生改变，但是至少派别区分已经出现，并朝着稳固的方向发展。相应的是，从前的小派别也走向整合、合并，如有学者指出，布鲁日演讲让原则上的疑欧派与机会主义疑欧派联合，最终成为一派，共同反对欧洲的政治社会一体化。⁵与此同时，不愿加入疑欧阵营的议员自然成为了亲欧一派，他们震惊或诧异于撒切尔的立场，更不能理解从“单一欧洲法案”到布鲁日演讲的转变，⁶自然要与疑欧派保持距离。

如果说演讲后仍存中间地带，那么在 1989 年夏欧洲议会选举后，该地带则迅速缩小。保守党的失利，使得以希思为代表的党内元老公开谴责撒切尔。⁷他们固然不再属于内阁，但一定代表了不少议会议员。由此观之，议员已经有了这一认识：再不选边站队、施压首相，会危害自己的选举。但撒切尔认为，参选者并非都是“布鲁日派”（Brugesist），批评有失公允，还损害了党的形象。⁸这无疑代表了对立意见。因此说，议会保守党的分野基本完成。

¹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p. 707-708.

² Ibid., p743.

³ Ibid., p746.

⁴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18.

⁵ Anthony Forster,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 p78.

⁶ 亲欧派议员当时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记述，但 Young 记录杰弗里·豪的观点说，撒切尔认同了签署单一欧洲法案时她自己决不会认同的观点，从中可窥见议会保守党的态度，参见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50. 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撒切尔通过布鲁日演讲变相承认了 1986 年自己的错误，但这一态度显然未能被亲欧派察觉，参见 N. J. Crows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 At the Heart of Europe?* p53.

⁷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p. 118-119.

⁸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49.

3. 节点三：1989 马德里峰会

同样是在 1989 年的夏天，内阁也终于因为欧洲问题走向对立。在 6 月的马德里欧洲理事会议前夕，内阁两位重臣：外相杰弗里·豪和财相奈杰尔·罗森，联合向撒切尔施压，要求她在马德里峰会上明确表态，支持加入 ERM，同时为加入设定具体时间限制；如果不这样做，两人就都将辞去现任职务。¹考虑到其时间的紧迫性、发生的突然性，用“政变”来形容这次行动并不为过，而首相也不得不在震惊中屈服，在峰会中宣布支持德洛尔计划第一阶段，同时承诺加入 ERM。²亲欧派用自我暴露的方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³

撒切尔认为该峰会应该讨论 EMU，以及欧洲应不应该有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毫无疑问她在这一问题上失败了，还无奈地部分认可了德洛尔计划。然而她也取得了成绩，其一是强调该计划不是唯一规划、不能有自动推进程序、不应该成为召开其他会议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合作停留于经济层面；其二是和法国各自发表宣言，这保证了外交的灵活性。⁴简言之，疑欧的议程也在继续推进，并没有因会前“政变”而转变。

就本文的观察角度而言，马德里峰会意味着内阁的对立正式形成，亲欧和疑欧两派明显分野。撒切尔夫人认为，此时的内阁整体左倾，豪作为政变的主要负责人，无疑是“左”的代表。⁵因此她对内阁做出调整，任命梅杰取代豪成为外相，而豪担任下议院议长，同时给予副首相（Deputy Prime Minister）的荣誉头衔。这一过程证明，此时内阁固然已出现派系分野和对立，但矛盾并非十分激烈，甚至派系本身仍有调整的可能。理由是，其一，豪最终接受了这一职位，并利用其影响力继续推动亲欧议程，而非直接决裂；⁶其二，“从犯”罗森并没有受惩罚，继续担任财相，这可能因为他并非主谋，更可能与他的 EMU 观点有关（如前文）。因此，此时内阁中的矛盾并不十分激烈，而是仍停留于“存在”的层面。

4. 节点四：1989 罗森辞职及其余波

然而正如本节开头所言，内阁的矛盾积累演化，要远快于议会保守党。当年十月，财相罗森向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辞职的请求。杨代表的学界观点认为，辞职是因为撒切尔偏听自己的私人顾问，而不理会财相本人的意见；⁷撒切尔认为，问题在于自 1987 年底以来，双方的不信任积重难返，才导致辞职。⁸本文认为，他们都部分正确，但却没有论及要点。本文的观点是，罗森意识到撒切尔不会再改变态度，特别是改变对 ERM 的怀疑，因此自己再多努力都不再有意义，更不可能通过自己希望的手段，控制通胀率并给经济降温。而正如前文所

¹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54.

²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20.

³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 p288.

⁴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50, p752.

⁵ Ibid., p756, p758.

⁶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63.

⁷ Ibid., p356.

⁸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14.

述，罗森偏爱的手段，正是欧洲机制和汇率。因此，根本上讲，是对欧态度分歧坚定了罗森的决心，¹这也回扣了前文“经济问题越发居于从属地位”的论断。

罗森辞职还引发了一系列后果，其一是豪公开赞赏了罗森，特别是在欧洲问题上的坚持，这毫无疑问是亲欧派的反抗；²其二则是撒切尔夫人任命梅杰兼任财相，将外相、财相两大职位全部委托给梅杰。这意味着内阁不仅因欧洲问题分为两派，首相及其内阁更为这种分野付出了代价。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其一，短时间内连损两位关键阁员，比只调离一位阁员要严重得多，内阁的稳定性遭受重创，首相及其政府的执政能力无疑会受到质疑。其二，作为党魁，撒切尔的个人权威受到打击。她在任命亲欧派时变得极端小心，即便委派也要确保关键部门在掌控之中，否则宁可一人兼二职。³同时，亲欧派代言人杰弗里·豪虽失去实权，但仍高调推进亲欧议程，这或多或少证明内阁其他部门中不乏支持者，甚至是坚定的支持者。这表明，党魁的欧洲观已经无法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反倒是招来批评。而考虑到内阁成分、议员升迁等等问题，她又不得不提拔部分亲欧派。⁴这无疑都是她自己付出的代价。

至此，1989年挑战之前的欧洲因素演变告一段落。从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通过开始，欧洲因素经由议会保守党、内阁两条线索，不断积累演化，最终在议会保守党中造成了派系分野，而在内阁中更进一步，整体为这一分歧付出了代价（见表2）。

表 2：欧洲因素的演变和积累

欧洲问题的演变和积累			
时间	事件	层级	节点
1986	《单一欧洲法案》通过	议会保守党	分歧出现
1987	ERM 之争	内阁	
1988-89	布鲁日演说、欧洲议会选举	议会保守党	分歧导致派系分野
1989	马德里峰会	内阁	
1989	罗森辞职	内阁	为分歧付出代价

资料来源：自制。

应说明的是，突出节点并不意味着欧洲因素是跳跃式演进，只是出于方便观察的目的才有所详略。同时，两条线索也并非绝对平行，如布鲁日演讲在内阁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最后，亲欧、疑欧有利益考量，但更是观念差异，认为疑欧派只是“抱怨不断”是不合理的。

¹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22. 该文论断与本文相同。

²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18.

³ 应说明的是，梅杰的兼职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撒切尔任命赫德接任外相。赫德并非疑欧派，但也谈不上是典型的亲欧派，他更多是一位专业官僚，执行上司的命令，因此任命他做外相是可控的，参见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25。而他在1990年挑战时表现的忠心、在梅杰首胜后立刻退出，都证明其政治野心较小，可印证上述判断。

⁴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754, p758.

（三）预兆：第一次挑战及其失败（1989年）

行文至此，不妨先回顾第一章末尾提出的问题：欧洲因素也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早有积累；即便按本章划分，1986年之后欧洲因素也已出现，那么为何直到1989年才引发挑战？

本文认为，是否导致挑战，取决于欧洲问题是否在全党造成了派系分野：是，则一年一度的挑战会被发起；否，则这样的挑战不会发生。显然，这一判断标准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证据是，其一，事实成立。根据前文，至1989年，议会保守党和内阁存在分野已成事实，换言之，全党此时皆可依据欧洲立场一分为二。所谓的“派系分野”真实存在。其二，逻辑推断。欧洲因素长期积累，然而1987、1988年均未出现挑战，1989年才出现挑战，因此一定是1989年出现了新的状况，而1989年出现的新情况正是派系分野。同时，根据某一个具体问题能将全党划为两派，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经济问题也许可以，但它已有大选作为裁定。就其他议题而言，众所周知，很多后座议员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抱看法，只是服从内阁政府命令而已。而欧洲因素此时便特殊在，它已真切威胁到普通议员的当选问题，或者说至少议员们认为它威胁到了，因此不得不选边站队、参与其中，其它问题上的合作只能搁置一边，优先解决最基本的当选问题。其三，符合常情常理。第一章曾述及，欧洲问题作为新问题，缺乏现有解决方法，紧迫性又相对较强，因此当两个鲜明的对立派别出现、又似乎造成了一些令人恐慌的结果时，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便已出现，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已具备。一言以蔽之，欧洲因素是挑战原因，宽泛地讲是正确的，而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它具体在何种情况导致挑战，则需要由“派系分野”这一可衡量的值来解释。

然而该解释并不能包含其它细节，如，为何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发起挑战？内阁成员为何没有及时调节、事先化解挑战？后一个问题相对好回答一些，此时内阁显然也已经分为两派，甚至还为分野付出了代价，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因此，“亲欧”的内阁成员没有动机阻止挑战，反倒有可能乐见其成，借此机会警示首相，让她意识到党内不满，及时改变政策；“疑欧”的内阁成员则没有能力阻止挑战，因为发起挑战的一定是“亲欧”派，他们为什么要采纳对立派系的意见？显然是没有理由的。

而第一个问题也与“派系对立”有关。是否存在派系分野，如前文所述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但它却不能刻画对立本身的激烈程度，自然也不能刻画“亲欧”派颠覆撒切尔夫人的紧迫性。事实是，“亲欧”一方只有一位梅耶议员发起挑战，本身就证明了本方能力或动机的不足；换言之，“亲欧”一方要么没有能力推出一位有力的代言人，要么根本就没有在意当年的挑战、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证明，此时虽然已有对立，但并不严峻。其原因也很好解释，其一是罗森辞职让内阁、撒切尔本人都付出了代价，众人期待首相能有所改观，因此没有必要急于挑战，也不至于跃出内阁框架解决问题；其二是杰弗里·豪依然宣传着自己

的观念，内阁中也不乏“亲欧”人士，这至少在内阁层面给予了希望，即问题仍能通过普通内阁议事方式和平解决。因此，如果说“亲欧”阁员没有动机阻拦挑战，那么他们挑唆挑战、甚至亲自发起挑战的动机也不充足。¹

综上所述，1989年才发生挑战的原因，是此时全党都已因欧洲因素完成分野，两大对立阵营出现。而1989年挑战分量不足、影响力不大的原因，在于内阁和首相已经因为对立付出了代价，挑战方意愿不足，重视度不高。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终结果：梅耶先生大家根本没有耳闻，显然所获票数少之又少，他们应是最坚定的“亲欧”派；“疑欧”派、期待首相付出代价后有所改变的“亲欧”派，自然投给撒切尔夫人。最终投票结果²证明，本文假设基本合理，大多数人仍支持撒切尔，期待不高的、或说顽固的“亲欧”派相对较少，首相因此得以在第一轮内结束游戏，继续担任党魁。

应补充的是，本文强调宏观研究，但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完全失灵，欧洲因素的程度只能主导大致的意向，而具体结果，如几人投票给挑战者、几人属于高期待的“亲欧”派、挑战于第几轮结束等等，可能仍要求助于其他因素，而不是一句决定论式的论断可以回答的。

¹ 这一推断是符合事实的，当时鲜见梅耶的辩护者，更没有公开的内部支持，参见 Philip Norton, “Choosing A Lead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1990,” p254.

² 绪论中曾提及具体票数，重复如下：撒切尔 314 票，梅耶 33 票，弃权 3 票，无效票数 24 票。

三、“从未败阵的首相”？¹——欧洲因素与第二次挑战

如前文所述，在对欧态度分歧积累已久之后，第一次对党魁的挑战接踵而来；而并不十分激烈的对立，使得第一次挑战最终失败。遗留的问题是，既然已经失败，为何 1990 年挑战仍然发生？而第二次挑战为何最终成功？本章就将关注欧洲因素的最后的演变，及第二次挑战的发生和成功，回答上章末尾的问题，并对最终结果进行探讨。

（一）激化：未成功的调和（1990 年）

1989 年亲欧派发起的挑战以失败告终，这证明在民主程序下，他们没能得到认可。那么又出于何种原因，亲欧派在一年后接续发起挑战？按照上文思路，是否有挑战发生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存在派系对立。因此很显然，1989 年挑战后，并没有出现缓和的进程，全党没能退回到派系之前，两派对立得以保留，发起挑战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所以挑战如期而至。此处的疑问是，既然已遭到挑战，“预兆”已经出现，首相为什么不回应党内呼声，想办法至少化解某一层面的派系对峙；反倒是容许其继续存在，保存了下一次挑战的条件？本节就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事实上，撒切尔当然意识到了亲欧派的不满，据她自己回忆，她增加了与后座议员的沟通次数，并和很多人进行了坦诚的对话。²虽然有学者怀疑这些交流的效果，³但不可否认的是，撒切尔的确在做出尝试。然而这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即在真实的政策上做出让步。1990 年 7 月，她拒绝了梅杰的提议，认为还不能加入 ERM。她认为，只有在利率手段对通胀起作用之后，才能带着自信和实力加入。这一时机终于在当年 10 月到来，其政府也终于在 10 月初宣布加入 ERM。⁴这可以算作撒切尔对亲欧派的实质性妥协。

然而这一妥协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其原因有二。首先是 ERM 的象征意义不比从前，欧洲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单一货币的追求已经出现。因此，亲欧派的成员更看重 EMU 的进程，以及最终统一货币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亲欧派对撒切尔做出了妥协，他们通过 hard ecu（见前文）计划，使撒切尔相信加入 ERM 并不必然导致货币一体化，而是有自己的替代方案。⁵撒切尔进而终于做出许可，同意加入该机制。

¹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208. 该形容指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大选从未败绩，在党内挑战中从未落败，即便是 1990 年也是高票领先、最终自己退出。采用这一形容，其一是揭示本章的主要内容，即探究最终结果；其二是突出问题所在，即“从未败阵”却仍然失败，并提供理论化的解释；其三，本文的解释认为“从未败阵”在宏观上是无意义的，因此使用问号结尾表示不甚赞同。

²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830.

³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 p24.

⁴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p. 723-724.

⁵ 参见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p. 132-133. 以及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p. 364-365.

原因之二则是，撒切尔在妥协后，仍继续大力推进疑欧的进程，并迅速超过了之前妥协的程度，使安抚不再有意义。其代表事件是1990年的罗马峰会，即欧洲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主持人的意大利总理突然发起表决，要求对德洛尔计划第二阶段——货币联盟设置时间表，结果毫无疑问，只有撒切尔投下反对票。10月30日，撒切尔回到下院，就德洛尔的最终计划——欧洲议会成为民意代表机构（democratic body of the Community）、委员会成为执行机构和理事会成为参议院，作出了连续的、鲜明的否定：“No. No. No.”¹这成为了撒切尔疑欧态度的最强硬表达，当然也成为了亲欧派愤怒失控的由来。

被激怒人中，最重要的应是杰弗里·豪，他在不久前还在采访中表达了对货币联盟的欢迎，甚至认为本国的hard ecu最终也会变成单一货币；²有观点因此认为，撒切尔的下院问答，让豪觉得首相正在关键议题上危害国家。³同时，亲欧派的诸多议员也会极端愤怒，他们已经失去内阁重臣，又认为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正在威胁自己的职位。⁴甚至连梅杰也大吃一惊，因为撒切尔同样否定了hard ecu的前景，这无疑让他的努力也大打折扣。⁵

这种愤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杰弗里·豪在这次发言后，宣布将辞去职务，并于11月13日在下院发表了演说。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他与撒切尔在ERM、EMU以及hard ecu问题上的分歧，并对实质问题和撒切尔个人风格都做出了批评，甚至直言不讳，认为“从政府内部解决矛盾是不可能的”。⁶这场演说，无疑改变了诸多亲欧派的心境，他们不仅意识到，期待首相从之前的代价中吸取教训、改变政策，是不可能的事；还听到了首相最长期的盟友，对首相政策、思路和风格的曝光。同时，疑欧派同样怒不可遏，他们在豪的采访后就曾表示不满，⁷而在“No. No. No.”回答后热烈喝彩，态度同样十分鲜明、不可撼动。

至此，可得出的结论有：其一，疑欧派的调和完全失败，派系对立的条件依然存在，欧洲因素导致挑战发生仍然成立。其二，欧洲因素的程度已经进入失控状态，相比于1989年挑战，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如果说1989年挑战，还有诸多亲欧人士心怀希望，认为首相会从损失阁员中吸取教训；那么1990年的此刻，他们的希望必然全部破灭，指望对方派系的改变已不再可能。事实是，撒切尔不仅强化了疑欧政策，更导致了杰弗里·豪的辞职和决裂。同时，豪在演讲中的呼吁，无疑起到了凝聚本方力量的作用，使欧洲问题完全成为了主导喜好的标准。⁸既然“政府内部解决矛盾”不再可能，那么只有诉诸挑战一条路了。

¹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42, pp. 145-146..

²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176.

³ Eric J. Evans,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 p113.

⁴ 有观点高度评价议员的作用，如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 p245.

⁵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176.

⁶ Sir Geoffrey Howe, “Personal Statement,” in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13 Nov, 1990.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90/nov/13/personal-statement>. 上网时间：2021-4-2.

⁷ 这主要体现在“布鲁日小组”的态度上，参见 Alan Watkins,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p145.

⁸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p369. 其与本文观点一致。

（二）终点：第二次挑战及其成功（1990年）

行文至此，不妨比对1989年挑战的分析，对1990年挑战进行解释。在1989年，有影响力的“亲欧”阁员，可能不会阻拦、但也不会鼓励或教唆一场挑战；然而当下，他们当然会鼓励、背书，如果挑战发生，他们一定会全情投入。在1989年，这些“亲欧”派可能不会亲自下场参与挑战，然而当下，他们一定会有此念头，这其中最突出的、最重要的、影响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曾经的阁员、曾任国防大臣的赫塞尔廷。

赫塞尔廷属于“亲欧”阵营自然是不争的事实¹，但他走向挑战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他在回忆录中说，在1990年春季，他仍不断重复、强调他“无法预知任何一个他会挑战撒切尔的情境”，以回应撒切尔支持者对他发起挑战的猜测；²五月，在回答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提问时，他再次否认会挑战撒切尔；³而直到当年11月1日，即豪已经宣布辞职后，他才宣称，他不发起挑战的信念有所动摇；⁴而在聆听完豪的辞职演说后，他才在震惊（shock）之中，在众人的目光和内心的诘问下，最后决定发起对撒切尔的挑战。⁵

如果说梅耶作为挑战者，预示了1989年“亲欧”派的缺乏实力或能力，那么赫塞尔廷作为挑战者，毫无疑问显示了1990年“亲欧”派的坚定与一致。不妨继续延续上一章的思路，对此时投票的可能性作一分析：

①1989年投票支持撒切尔的议员：

（1）坚定的疑欧派：毫无疑问，他们会继续投票支持撒切尔夫夫人；

（2）温和的疑欧派：他们与约翰·梅杰所持观点应该相似，即更现实、更重视操作性的“疑欧”议员，他们可能会基于立场，继续投票支持撒切尔；也可能基于实际政治操作或党内团结，放弃投票；具体有多少坚定、有多少弃权，本文无法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挑战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之后的领袖，目的是既保留“疑欧”的政策取向，又同样保证可操作性和全党团结；（这一类显然不包括梅杰本人，他作为内阁重臣，既是撒切尔的提名人，也一定会投票给撒切尔，他本人在回忆录中便这么说，⁶本文也采信这一说法。）

¹ 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参见 Michael Heseltine, *Life in the Jungle: My Autobiography*, p343.

² Ibid., p352.

³ Ibid., p353.

⁴ Ibid., p355.

⁵ Ibid., p362.

⁶ John Major,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pp. 183-184.当然，在具体的挑战声明中，他不仅提到了欧洲（见第一章），也提到了投票税，但这不能证明投票税是一个真实的原因。其一，正文所说，直到1990年11月他仍无心挑战，而投票税此时不仅存在，更已渡过了危机阶段，如果说因为投票税发起挑战，为何要持续做如此表态？其二，本文在第一章提出，并不是投票税本身很可怕，而是投票税带来的动荡、分裂很可怕，这让保守党议员普遍感到恐惧。作为政治人物，赫塞尔廷当然希望挑战能够成功，也当然就会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材料，投票税成为了恐惧的代名词，因此当然出现在了声明中，以唤起更多的撒切尔反对者。当然，赫塞尔廷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可能真的认为投票税应是一大原因，但就本文的分析而言，客观上讲，投票税并不是原因之一，更不可能决定结果。

(3) 期望首相能吸取经验、有所改变的“亲欧”派：如前文所述，议会保守党、内阁两大层面，均已因欧洲因素而分为两派，即实现了派系分野，而罗森辞职，便是首相个人、也是内阁全体，为这种分裂付出的代价。不乏很多“亲欧”议员，认为撒切尔夫人会因这种代价而改变，因此在当时支持撒切尔；然而，1989-1990年的事实，让他们意识到撒切尔很难实质上做出调整，甚至还会激化矛盾，豪的辞职和演讲就是最大警醒，因此他们中绝大多数，在1990年应当会转而投票支持赫塞尔廷，这也是两次投票最大、最明显的变动所在，因此，粗糙地讲，撒切尔在两次挑战中票数的差，应该与赫塞尔廷和梅耶的票数差相差不远；

②1989年投票支持梅耶的议员：他们应当是最坚定、最顽固的“亲欧”派，前文所述，梅耶自己声称，他因为欧洲问题发起挑战，这也几乎是他唯一的政治口号。力量差距如此悬殊，支持撒切尔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而在这种情况下，仍为梅耶投票的所有议员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基于极为“亲欧”的立场，他们在1990年显然会延续一贯立场，继续投票支持赫塞尔廷。（见表3）

表 3：欧洲因素如何决定 1990 年挑战的结果

欧洲因素如何决定 1990 年挑战的结果						
		1989 投给梅耶			1989 投给撒切尔	
		坚定疑欧派	温和疑欧派	带有期待的亲欧派		
投票支持撒切尔	几乎没有	绝大多数	一部分 (其余弃权)	几乎没有		
投票支持赫塞尔廷	绝大多数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绝大多数		
是否整体改变意向	否	否	较少	绝大多数		

注：按前文，撒切尔减少的票数≈赫塞尔廷所得票数-梅耶所得票数。

资料来源：自制。

最后的投票结果¹基本印证本文判断，撒切尔夫人的得票大幅减少了 110 票，而赫塞尔廷相比于梅耶，多得了 119 票，数字比较接近。同时，它揭示出，多数温和的“疑欧”派在投票中仍支持首相而非弃权，因此撒切尔夫人维持了多数。但随着大量亲欧人员的转投，她当然没能在一轮内终结比赛，挑战将进入第二轮，重新报名、提名和投票。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致力于中观研究，只根据选举机制计算、推演，而是坚持宏观原因角度分析的重要性，此处的计算只作大致验证之用。更关键的是，挑战进入第二轮前，即在两轮投票的间隔期内，撒切尔夫人被自己的中低级内阁成员施压，不得不退出挑战。这是中观研究所不能解释的，而本文却可以给出答案：前文所谓的温和“疑欧”派，其实大多

¹ 绪论中曾提及投票结果，复述如下：撒切尔 204 票，赫塞尔廷 152 票，弃权 16 票。

数就是内阁中低级成员，以及受这些成员影响的普通议员。低级阁员多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的提拔，多数人的“疑欧”立场比较可靠，¹所以在投票中，他们理所当然投票支持撒切尔。然而他们同样不断接触政治实务，在投票之外，他们又不得不回到现实当中。撒切尔妥协失败、豪的演讲等等因素，也即欧洲因素，造成了党内的分裂和政治操作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才施压撒切尔。这与撒切尔本人记述比较符合，在谈话中，他们纷纷承诺，在投票中已经、并将继续支持首相，但是却用大同小异的理由劝退撒切尔。²而可以推测，受他们影响的议员，也会采取相似的立场。这一现象是用“机制”的规定和琐细文字所无法解释的，³但却是欧洲因素发挥作用的真实证据。因此，撒切尔夫人的确是“从未败阵的首相”，但这只是一种宏观上毫无意义的胜利，当她让带着期待的“亲欧”派失望，又吓到了极具现实感的温和“疑欧”派之后，她其实就已站上悬崖的边缘。

一言以蔽之，欧洲因素造成的派系对立得以保留，这激发了第二次挑战；而指望首相改变策略的失意“亲欧”派，坚定地按立场投票，主导了投票的具体过程、轮数和票数结果；注重实务的温和“疑欧”派，促成了撒切尔最终下野。这便是“疑欧”、“亲欧”之争与撒切尔夫人的下野的具体关系。

¹ 这与前文提到的撒切尔出于团结不得不任命亲欧阁员并不矛盾，其一，这些任命是在已经损失亲欧阁员的前提下，做出的一些补偿；其二，即便任命也不会权力过重或数量过多，首相当然不会制约自己。

² 相关事实参见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pp. 850-855. 阁员纷纷表态，在投票中已经、并会继续支持撒切尔，但认为尽管自己投票支持，但撒切尔仍会输掉第二轮投票。

³ 现有成果仅仅停留在政府成员出于尊严和荣誉，建议她主动退出，参见上一注释。这一说法是微观层次的，没有考虑深层动因。相似的说法是，大臣们认为赫塞尔廷会赢，但决不想成为他的阁员，因此阻止，而为什么不希望赫塞尔廷赢，这基本符合正文观点。至于经济主张，根据赫塞尔廷在梅杰政府的表现，应该是不成立的，参见 Tim Bale, *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 p285, p248.

结语

本文探讨了“亲欧”、“疑欧”在撒切尔时代后期的影响：自1986年以来，对欧态度分歧造成了派系的对立，而由于处理不当，对立得以持续存在，分别导致了两次挑战。其二，两派的对立不断积累，虽然第一次仍有改变、期待余地，但第二次却难以调和，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最后结果，通过“挑战”、劝说的方式，造成了撒切尔夫人的下野。

然而，撒切尔夫人虽然离去，但仍遗留下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首相是否成功化解了派系对立？如果没有，为什么后来欧洲问题没有再引发挑战？这涉及两大层面。其一是挑战机制的变迁，1997年之后，发起挑战的规定有所调整，同时投票权也逐渐扩大，并沿用至今。这一转变是否与欧洲问题有关？又何如塑造了之后的欧洲问题斗争？这是本研究自然的逻辑延伸。其二是欧洲因素自身的演变。从事实角度而言，经济问题在撒切尔之后已不成为问题，就连作为对手的工党布莱尔（Tony Blair）政府，也承袭了她的经济政策，这证明关于经济已达成共识，无需再争论。那么是否有可能，欧洲问题继承了之前经济问题的地位，成为了大选中竞争最激烈的问题？欧洲问题在人事变更中的“大选决定论”，是否适用于1990年之后的保守党党魁人选？这当然是另一个相关的重要议题。

除此之外，撒切尔因经济问题上台，这使得研究者们更多关注“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经济层面，至多涉及社会、伦理等内容；然而被忽视的是，她的突然下台却是因为一个全新升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新问题，即欧洲问题。那么这一思路是否可以用于观察类似的领导人？如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或其他著名首相，是否也可以借用本文的框架予以解释？这当然是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需要深入研究。

撒切尔的离去同样是分析今日英国的一把钥匙。有观点便认为，今日的疑欧思潮起源于撒切尔。¹那么亲欧派与疑欧派的斗争，在脱欧之后如何定位？又将如何影响英国对外政策？它与“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政策会如何互动？²这些问题尚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英国的对欧态度，仍将深刻影响双方的合作与纷争，撒切尔下野的探源，在分析解决此类政策问题时，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意义。

¹ Cary Fontana and Craig Parsons, “‘One Woman’s Prejudice’: Did Margaret Thatcher Cause Britain’s Anti-Europeanism?” p89.

² 此政策为英国最新对外战略，具体做法参见 HM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rch 2021, pp. 14-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上网时间：2021-3-26.

³ 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第四版）》，第448页。其表达的观点与本文类似。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第四版）》，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谢峰：《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英文著作：

Bale, Tim,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

Bale, Tim, *The Conservatives since 1945: The Drivers of Party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rowson, N. J.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 At the Heart of Europe?*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7.

Evans, Eric J.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7.

Forster, Anthony,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2.

Gamble, Andrew, "Europe and America," in Jackson, Ben and Saunders, Robert, et al., *Making Thatcher's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Green, E. H. H. *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 Conservative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eppell, Timothy, *Choosing the Tory Leader: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 London & NY: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8.

Heseltine, Michael, *Life in the Jungle: My Autobiograph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2000.

Major, John,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N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Thatcher, Margaret,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Watkins, Alan,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1991.

Young, Hugo,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98.

英文期刊文章:

Cowley, P. and Garry, J.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 The Choosing of John Maj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3, 1998, pp. 473-499.

Daddow, Oliver, "Margaret Thatcher, Tony Blair and the Eurosceptic Tradition in Brita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2013, pp. 210-227.

Denham, Andrew, "From Ted to Ed: Electing British Party Leader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83, No. 3, 2012, pp. 576-584.

Fontana, C. and Parsons, C. " 'One Woman's Prejudice': Did Margaret Thatcher Cause Britain's Anti-European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ervice*, Vol. 53, No. 1, 2015, pp. 89-105.

Jesse, Neal G. "Thatcher's Rise and Fall: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ory Leadership Selection Process," *Electoral Studies*, Vol. 15, No. 2, 1996, pp. 183-202.

Norton, Philip, "Choosing A Lead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1990,"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43, No. 3, 1990, pp. 249-259.

网络资料:

Conservative Party, *1987 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 The Next Moves Forward*, 1987. <http://www.conservativemanifesto.com/1987/1987-conservative-manifesto.shtml>.

上网时间: 2021-5-27.

HM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rch 2021, pp. 14-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上网时间: 2021-3-26.

Howe, Sir Geoffrey, "Personal Statement," in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13 Nov, 1990.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90/nov/13/personal-statement>. 上网时间: 2021-4-2.

Thatcher, Margaret,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20 September, 1988.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上网时间: 2021-3-9.

致 谢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终于告一段落，这项工作自2020年10月开始，自2021年5月终止，历经确定领域、阅读材料、草拟题目、动笔写作、修改定稿多个阶段，可以说贯穿了大四一整学年，是这一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仍能回忆起秋季学期每周一下午，在院图书馆值班时阅读英文材料；也可以想到春季学期，黄沙漫天的季节里坐在电脑前写作；当然，在突然到来的暑热中反复修改、敲打细节，更是新近发生，记忆深刻。但无论如何，这项工作都已结束，不敢说水平多高超、内容多新颖、理论多完善，但至少我将它当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投入了大量精力，至少可以说问心无愧，也可以是北大本科生涯的一个句点了。

在这过程中，当然要首先感谢指导老师梅然老师。与梅老师初识于大二春季的英国课程，大三一年虽联系不多，但又在大四秋季继续修习老师开设的选修课。其间问的问题不少，有质量的不多，不敢说让老师印象深刻，但总归让老师记住了这张面孔；也承蒙先生不弃，愿意接纳我作为研究生指导对象。就这篇文章而言，从领域、材料，再到定题、修改，老师无一不参与其中，其悉心教导、耳提面命，让人如坐春风、醍醐灌顶。无论是初稿形成后，不厌其烦耗费一整下午时间指导；还是修改稿出炉后，连注释中首字母没有大写都能发现的细致入微、尽心尽责，都让人肃然起敬。我自知无论是论文，还是更广泛的学业，都有太多不足之处，但也终能忝列门墙，在研究生两年时光中继续跟随老师学习探索。

当然，父母的支持更是我学习的基础与支柱。不敢言所学甚多、所知甚广，但若非要举出一件本科期间学到的道理，那便是重视、珍惜我们的家庭。这不仅塑造了我，也改变了家中的每一个人，也正是这一个一个小家，构筑起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成为伦理、道德和信仰的发祥地，成为常识、经验和正义的避难所。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变化，其中一些饶有趣味，但大多数荒谬至极。总有人喜欢把放纵、无道、败坏说成进步或自由，乐意将美德、传统、历史称为黑暗和负担，结出恶果还懵然无知，助纣为虐还自以为是。当然，我也只是普通人，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家庭，虽然会揶揄国际大事、妄言天下之道，但归根结底也只是儿子、亲人、朋友、同学。因此，家庭的光亮再一次凸显，每当想起与父亲煮酒论英雄，与母亲饭后百步走，或想到以后我可能组建的家庭、拥有的生活，我还是会感觉到温暖、安心。纵然发生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遭遇了代价最为惨重的失败，但历史不会终结。即便终结，那也不该是人类考虑的事；即便终结，我们也无法预知；即便终结，我们也至少在世间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体验了一回，有父母亲人、有知己好友、有天下同胞，他们留给我的记忆与启迪，超越了四年本科时光，成为了永久的人生印记。

这便足矣。

2021年5月22日雨夜 于燕园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诚信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尊重并一贯遵循北京大学及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风、品格，在论文写作中严格遵循诚信原则。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借助北京大学毕业论文（设计）管理系统，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及相关检索功能，检查得出如下结果：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为 8.1%，符合学校及学院查重规定和相关学术惯例。特此说明。

论文作者签名：宋仪萱

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 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宋仪萱 导师签名：梅

日期：2021 年 5 月 28 日